

浙江妈祖信仰的“佛教化”研究

陈政禹

【摘要】妈祖的宗教属性问题是妈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佛教化”的角度，以浙江地区为中心，通过大量明清地方志的记载，考察了明清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类型和空间分布，分析了妈祖信仰在浙江佛教化的原因，指出妈祖信仰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妈祖信仰；浙江；僧人；佛教化

妈祖信仰自诞生以来，便随着渔夫的船只在沿海各地生根发芽；妈祖经历代王朝帝王的加封，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海神。随着妈祖信仰的兴盛与发展，儒释道三家都试图用自身的理论体系对妈祖的神行作出解释。关于妈祖的宗教属性问题，不同学者给出过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妈祖非佛也非道。如谢重光在其文章《妈祖崇拜宗教类型之我见》中认为：“妈祖崇拜中虽然杂有若干佛、道的因素，但从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看，从一些重要的外部特征看，它并非道教的一部分，亦非佛教的一部分。”^[1]一种观点认为妈祖应为道教神。如萧登福的《从文献简论妈祖神格的宗教属性》认为：“我们以宗教本身的规范来检视妈祖，可以确定妈祖是道教神祇。妈祖被视为佛教徒或佛教属神，实是出自台湾地区的特殊现象。”^[2]一种观点认为妈祖应是三教融合的产物。如王文钦的《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指出：“儒释道的融会贯通是妈祖信仰最深刻的文化底蕴。”^[3]一种观点认为妈祖信仰中佛教的因素更多一些。如王荣国在《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一文中指出：“妈祖庙由僧人住持并非只是台湾普遍的现象。妈祖庙由佛教僧人管理、妈祖信仰与佛教信仰互融的‘佛教化’现象可远溯宋代南方。”^[4]

关于妈祖神性的问题，尚不能确定哪种说法完全成立。但笔者通过对浙江的地方志文献进行整理，认为佛教性是妈祖重要的神格属性，这点在浙江的妈祖信仰表现中尤为突出。下面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表现

早在宋代，妈祖信仰便传入浙江，如杭州的艮山顺济妃庙便是祭祀妈祖的场地。妈祖信仰在浙江的传播和生长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佛教化”特征：

（一）妈祖放入佛寺中祭祀

供奉妈祖的庙宇被毁后，妈祖改在佛寺中祭祀往往是首要选择，这种现象在浙江很普遍。如在浙江的嘉兴，光绪《嘉兴府志》有云：“天后宫，在府治东北二里……咸丰间毁，今权在觉海寺致祭。”^[5]在临海，据元代周伯琦《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记载：“海之神曰天妃……纵火焚掠，楼亦随毁。守者复奉神像旅寄天宁寺。”^[6]文中的“天妃”即是妈祖。由文中可知，这两个地方都是因为天妃庙被毁，妈祖神像被移入佛寺拜祀。

在海宁，据乾隆年间的《海宁州志》卷六记载：“天妃庙，在县东五里，元大定四年海患庸田，副使张子仁建，元许德柔记，今移置州西三十步，海宁所天妃十庙分建千百户营，明初所官分汛海道，故各建祀，万历间五庙并庆善寺。”^[7]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七对清代天后宫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天妃庙，今称天后宫，在县东五里，元大定四年海患庸田副使张子仁建，后改东岳行祠，明成化十三年移建州治西三十步，清康熙初复建，前殿供奉天后，后殿供奉大士像。”^[8]对此文解读可知，海宁的天妃宫

在明万历年间曾并入到寺院之内，清康熙年间重修时仍把妈祖与佛教的观音并祀。可见在当地的妈祖信仰中，祭祀妈祖已被当作佛教活动的组成部分。

妈祖入祀佛寺的现象也出现在舟山普陀山的法雨寺。关于法雨寺的位置，清代许琰《普陀山志》卷十五中有记载：“航海由沈家门过莲花洋，抵普陀洛伽山，是为观音大士说法道场，有两寺，在前曰普济，在后曰法雨。”^[9]法雨寺开辟出了专门位置供祀妈祖，据《普陀山志》中的《重建普陀前后两寺记》载：“先到逸云庵，为老僧性统，退居旧所。一折而东，再折而北，度新石桥。旧入寺者，路从西，地家谓生气东旺，故改于东首。建高阁三闲，供天后像。凭阑一望，海天万里。”^[10]

在海盐，天启年间的《海盐县图经》卷三有云：“慈会寺，县治西三十步思鲁桥东，寺旧为玄帝祠，祷者立应，天妃宫道人陈善明居之起合供设佛像，善明复延金粟僧惠钦为住持。”^[11]天妃宫人居住在佛寺之内，自然会将妈祖信仰带入佛寺之中，这说明妈祖信仰对佛教是带着一种亲近态度与之相处的。

妈祖神像身处佛寺之中，接受僧众和信徒的朝拜，自然会浸润在佛教文化之中并成为其中一部分。

（二）寺院发展为天妃宫

不论是佛教还是妈祖，对其信仰都需要寺庙这一物质载体。在青田，光绪年间的《青田县志》卷七记载：“右陀罗尼经钟，不知何寺故物，今在青田县天后宫，以一区铸陀罗尼经文十三，通钟带闲，周遭铸心经一篇。其余铸击钟偈语并列守僧众名及年月。”^[12]天后宫中留有佛寺大钟，表明天后宫很可能是由佛寺发展而来，因为钟是佛寺的重要器物。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清代张殿魁《天后宫铸钟炉序》的记载中：“盖闻钟铸自鳧，而寺院籍以警众生。炉制于丁谖，而庵堂用以祀香火。故寒山之寺有钟，博山之上置有炉。非所以壮丽观瞻，皆所以尊佛法也。我乡玉屏山下有庵，原古之云际也，今于嘉庆初新为创造，更名天后宫。”^[13]《天后宫铸钟炉序》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钟为佛法的象征，二是佛庵改为天后宫后也可以造钟以尊佛法。

在杭州，万历年间的《杭州府志》卷之九十八云：“延圣寺在会宁隅，面江，宋绍兴间始建庵，乾道间潮势怒激，孝宗祷而息，赐清波门外，延圣寺额改庵为寺，崇奉天妃。”^[14]关于此事，明代吴之鲸在《武林梵宇志》中也有记载：“延圣寺，在候潮门外，宋乾德间吴越王建于清波门外，名土宿院。天圣二年，超法师沿江施食以济修堤之士，诏移院于今所，赐额‘延圣’。嘉定年间御带陈玉节于寺侧建天妃殿，崇奉海神。”^[15]两处文献内容虽有所差异，但描述的都是杭州延圣寺的情况。从文中可知，早在南宋年间，杭州郊外的佛寺中已经供奉妈祖。

在余姚，光绪年间的《余姚县志》卷十一云：“法性院，在县东二百三十步，晋天福七年邑人于古大宁寺基上建有大士像，随潮而至父老迎置于院，改观音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赐今额，元改为天妃庙。”^[16]

由寺院发展而成的天妃宫，必然保留大量的佛教元素，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妈祖信仰与佛教相互交融的产物，以及妈祖信仰“佛教化”重要的指示器。

（三）妈祖庙由僧人主持

如果说庙宇是体现信仰的物质载体，那么庙宇的主持者则主导着庙宇的精神走向。浙江地区出现了很多由佛教僧人主持妈祖庙的现象。

在镇海，光绪年间的《镇海县志》卷三十记载：“宗辉字净月，普庆庵僧，与畹荃同为育王秋远高弟子。当道闻有干才，延主邑中总持寺，修造钟楼、鼎兴天后宫。”^[17]由此可知，天后宫由僧人主持修建。

在乐清，光绪年间的《乐清县志》卷二《重修天妃宫建德星亭记》载：在盘石南门外……至冬十月，既望而落成之，奥有堂寝，环有廊庑，游有亭馆，奉以僧之明显者。由文可知，乐清南门外天后宫建成之日就有僧人进驻。

在平湖，光绪年间的《平湖县志》卷二记载：“乃捐建小庵，额曰中普陀禅院，供奉大士、天后、三官、龙神香火，延僧静修，专司灯事，朝暮添续膏火，务使双灯长明，山门内外又设有巨钟、大鼓，时防昼夜潮来，凭高振响。”^[18]又据《平湖县志》卷九记载：“福建余正健，三山会馆记略，闽省之贸迁于乍城者不一事，而业杉者十居二三，会乡井于他邦捐让相将其可无行礼之地乎，缘于康熙己丑，购蜃园旧址，崇建天后殿宇，虔奉祀事用酬航海安澜之庇，置田延僧，永香火焉。”^[19]又据邹璟的《乍浦备志》卷二十记载：“东门内天妃宫，嘉靖时建，俗名女东庵。”^[20]说明当时平湖乍浦镇的天后宫由比丘尼主持。从以上材料可以获得的信息是，明清时期的浙江平湖，佛教僧尼主持天后宫的现象很普遍。

在舟山，天启年间的《舟山志》卷之四的《天妃圣母祠记》中云：“万历辛巳，参戎袁侯持天子命来守是邦，下车提疆，事巨细轻重，布之策画理甚，展春登谒圣母，顾前叹曰：泽国洪济，寔式凭之，我军民所共乞灵者，屑越之也辄捐俸如干，倡为更始，偏裨捕校，亦无不捐者，聚财鸠工，命善官郭镐，善人赵兰，翁洋，王祖仪，住僧如清经纪之。”^[21]据蒋维钺的《妈祖文献汇编碑刻卷》的校记：“碑文所记当为浙江舟山沈家门天后宫。”^[22]“住僧如清经纪之”表明沈家门天后宫在万历年间已经有僧人进驻，并且有资料显示这种现象至民国时期仍然存在。郭永昌的《沈家门天后宫》记载：

民国初期，（沈家门）天后宫已有大小殿屋 60 余间，总占地面积约有 15 亩左右，成为当时舟山群岛最著名的天后宫之一。天后宫最后一次重修和扩建是在民国 11 年（1922 年），这次重修和扩建是由常住天后宫的普陀山佛首庵僧人灵灿法师主持的。因当年百年未遇的强台风将天后宫东首的东岳殿及厢房刮倒，台风过后，灵灿法师四出募捐，并依靠教场等地的郑姓、朱姓柱首配合、支持，重新拆建、扩建东岳殿及厢房十余间，翌年竣工，宫貌焕然一新^[23]。

由上文可知，沈家门天后宫在明万历年间便由僧人经营，到 1922 年，仍由僧人主持。可见，沈家门天后宫由僧人主持现象，自明代起便成为惯例。

普陀山的福泉庵也有类似情况。清代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云：“天妃宫，在司基湾西，僧大慧建。”^[24]而《普陀洛迦新志》卷七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天妃宫，在司基湾西，僧大慧建。今改福泉庵。”^[25]福泉庵由僧人创建，且至今供奉妈祖像。据《普陀山志》载：

福泉庵位于司基畝西南，旧名天妃宫。清康熙间西域僧大慧建。光绪间僧广莹、清念相继修葺。1985 年，出家于该庵、现旅居新加坡的僧印实捐资 18 万元大修。建筑面积 3528.47 平方米，殿堂楼阁 91 间。庵内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大悲楼等各居一方，殿堂厢房围成天井。大雄宝殿供 5 米高的释迦牟尼佛坐像，旁边的佛龕供杨枝观音、地藏菩萨，两侧是十八罗汉像。后又塑天妃娘娘，普陀山佛学院设此^[26]。

僧人作为妈祖寺庙的主持，自然会对妈祖信仰作出符合佛教教义的解释，使妈祖信仰“佛教化”。

（四）在佛寺附近供奉的妈祖

佛寺周围供奉的民间神祇多具有佛教元素。在浙江，也有将妈祖供奉在寺庙周围的情况。据光绪年间的《浦江县志》卷十三载：“天后宫，在县南隅白佛寺之右。”^[27]光绪年间的《平湖县志》卷二云：苦竹山，在县东南二十九里……山有竹林庵，九山志云在天后宫西北。而据明代苏伯衡的《清泉庵记》记载：“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阳……乃相与之县南岭门之清泉庵……庵为若干间，大山屏其东，天妃庙峙其南。”^[28]可知早在明代以前，平阳县的佛教寺庙周围便供奉着妈祖。综上可知，妈祖与佛寺相互依傍，有着共同的香火群体，构筑起了共同的信仰系统。

二、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分布

笔者对明清时期浙江地方志及相关古籍进行查阅，发现妈祖信仰佛教化的情况在很多地区都有出现，现罗列如表 1 所示。

表1 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分布表

所在州县	数目	名称	修建情况	修建地点	资料出处
嘉兴府	1	天后宫	宋乾德中建	府治东北二里	光绪《嘉兴府志》卷十
海盐县	1	慈会寺	不详	县治西三十步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三
太平县	1	新庵	不详	郭村	嘉庆《太平县志》卷八
镇海县	1	天后宫	不详	不详	光绪《镇海县志》卷三十
平湖县	2	普陀禅院 女东庵	女东庵修建于嘉靖间	女东庵在东县门	乾隆《平湖县志》 道光《乍浦备志》卷二十
青田县	1	天后宫	不详	不详	光绪《青田县志》卷七
杭州府	1	延圣寺	宋绍兴间	清波门外	万历《杭州府志》卷九十八
海宁县	1	庆善寺	庆善寺建于梁天监七年	庆善寺在县西南二百步	乾隆《海宁县志》卷六
		天妃庙	天妃庙建于元大定四年	天妃庙州治西三十步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七
余姚县	1	法性院	大中祥符元年	县东二百三十步	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一
临海县	1	天宁寺	不详	不详	周伯琦《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
舟山	3	沈家门天后宫 法雨寺 福泉庵	沈家门天后宫建于万历辛巳年间 法雨寺建于雍正九年	法雨寺在普陀山 福泉庵司基湾西	天启《舟山志》卷四 《普陀山志》卷十五、卷十二 《普陀洛迦新志》卷七
浦江县	1	天后宫	乾隆五十八年建	在县南	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

浙江与佛教有关的天后宫远不仅限于此。据同治年间的《嵊县志》卷七记载：“敕封天后，凡滨海之处多立庙宇不能胜，载惟寺额旧志称天妃，今改称天后。”^[29]佛道对各自的宗教活动场所都有特定称呼，佛教一般称寺、院、庵，而道教则称观、宫，这里的“寺额”二字说明了在浙江，大多数妈祖崇拜的场所均与佛教相关。

三、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原因分析

浙江妈祖信仰的佛教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妈祖信仰这方面而言，实现佛教化有利于其在浙江地区的传播。浙江佛教在五代吴越国和宋代进入极盛时期^[30]，因此对产生于宋代的妈祖信仰来说，“佛教化”既可以利用佛教既有的信仰范围和传播途径来消除本地民众对外来神祇的心理障碍，还可借助熟悉宗教事务的僧人的力量来管理妈祖信仰场所。因此传播妈祖信仰的主体，往往会依托佛寺这个平台来供祀妈祖。

妈祖信仰的传播主体之一是福建林姓。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妃林姓，旧在兴化路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州地也。”^[31]因此福建林姓将自己视为妈祖的后人，而妈祖信仰也随着他们的迁徙而向外传播，这在台湾的《林氏姑婆祖碑记》中就有所体现：“天上圣母，保障四方，慈帆广济，报应设施，其捷如向，所以南朔东西无不崇奉者也。兹因阿猴我林姓姑婆祖仅存公银七十员……”^[32]可见，在台湾出现了在林姓聚集的地区供祀妈祖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浙江沿海地区。如嘉庆年间的《太平县志》卷之八记载：“新庵，在郭村，林姓奉祀天妃于此。”^[33]苏伯衡的《清泉庵记》记载：“余客平阳……县南岭门之清泉庵，初取到林氏屋侧……庵为若干间，大山屏其东，天妃庙峙其南。”^[34]由材料可知，浙江的林姓居民在佛庵或佛庵周围供奉妈祖。可见在浙江，福建林姓借助佛教信仰系统来传播妈祖信仰。

妈祖的传播主体除了福建林姓外还有其他闽人。闽人在浙江修建了很多天后宫，如宣平县天后宫是在乾隆三十八年由闽人陈合聚、唐宏利、唐鼎利、邹安宝创建^[35]。青田县天后宫，在县西南，前临好溪，乾隆三十三年闽人建^[36]。永嘉县天后宫为乾隆六年兴化莆田商人建^[37]。需要注意的是，闽人在浙江除了修建大量的天后宫外，还修筑了很多寺院，如光绪《宣平县志》云：“胜莲庵在县西北福缘山，顺治间僧岳鸿结庵……闽人因业贾往来，于群巖之山家，偶至福缘山下，见群峰倚天，万壑淘雪，悬崖断壁，天设幽奇。久而悟曰维缘有福兹则是欤。遂择其山盘结而水朝宗者数笏，锄土诛茅，尽捐贲囊，结宇以栖礼娶僧履。”

^[38]又据《钱塘县志》云：“光福寺，明万历间，僧石山建，闽人陈玉宇蔡辰海哀闽人之客死者皆无所归，因倡首敛金，意造庵堂。”
^[39]由此可知，闽人在浙江修建妈祖庙宇的同时还捐建佛寺。因此，闽人很可能在捐资修建佛寺的时候把妈祖信仰带入佛寺之中，利用佛教的渠道传播妈祖信仰。

从佛教这方面来说，经济利益是一个重要因素。佛寺的发展需要百姓香火的支撑，因此把百姓认可的民间神祇纳入寺院供奉是增加香火的一个重要方法。《普陀山志》卷十二云：“雍正九年辛亥，发帑七万修建普陀，时法雨住持法泽，谓山在海洋，礼香者皆由舟楫，而寺中从未奉有天后香火，甚为缺典，乃谋建阁三间以祀。”^[40]从文中可知，因为来普陀山法雨寺的香客多是乘舟而来，因此供祀妈祖既满足了香客的需求，也增加了寺庙的香火来源。

从义理上来说，妈祖信仰与佛教并不相悖。佛教中有“垂迹”之说。唐代释澄观《华严大疏钞》卷八十五有云：“不思議迹也，然幽关难辩圣应不同。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不思議一也。”^[41]所谓“垂迹”，就是指佛菩萨拥有无量化身，可以幻化成世人的模样以普渡众生。佛菩萨的实身就是本，化身称为垂迹。宋代黄渊在《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厘殿记》中认为妈祖是观音的化身：“泉南、楚越、淮浙、川峡、海岛，在在奉尝，即普陀大士之千亿化身也。”^[42]而佛教中的观音就有护海功能。《妙法莲华经》有云：“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43]“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说明了观音驾驭海洋、消除灾祸的能力。因此，妈祖信仰在佛教义理上也可以找到自身的理论依据，人们也往往把妈祖作为佛教中的菩萨来看。如元代李士瞻在《海上祈风投词》中写到：“恭惟天妃，夙契道缘，普济生灵，仗佛光真乘之威。”^[44]

四、其他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佛教化现象

除了浙江外，妈祖信仰的佛教化在其他沿海地区也有出现。在辽宁沿海地区，据清代沈时的《重修三江会馆碑记》云：“盖平自开海以来，三江士商乘槎而至者络绎不绝。始于康熙四十二年，同志捐资购地于县之东南隅，创建三江会馆，内供天后圣母诸神圣像……以备修葺殿庭及香火僧人之需，住持遁而洒扫稀……余资已典置市椽地产，计每年之出息，上供香火，下饷僧人。”^[45]由文可知，在辽宁盖县的天后宫，僧人是作为天后宫主持存在的。在河北，据光绪《大城县志》卷十一记载：“东西三楹，前后亦三楹面，供天妃三像及司福禄子嗣灾殃之神无不毕具。背面向水，复供三大士及一切水府之神……其为僧也，以戒律胜，以诗画胜，以幽淡枯寂胜。”^[46]由文知河北大城的天后宫为僧人负责。在天津，据元代危素的《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记载：“庆国利民广济福惠明天妃祠，吴僧庆福主之。”^[47]可知元代的天津已有天妃庙，并由僧人主持。在江苏，李丑父在《灵惠妃庙记》中有云：“壬子岁，正殿庙门西偏集福堂落成，守僧与祀饗者皆有所止。”^[48]这表明早在南宋时期，江苏镇江供奉妈祖的寺庙中就有僧人进驻。在福建，据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载：“神宫凡三处，一在南门外厂口，一在十五都围头。而在南门外为岁时致祭之地，尤为庶姓所瞻依者，即此是也。溯自宋庆元间。神示梦海潮庵僧，俾作宫于此。”^[49]可见，福建晋江最早的天后宫由僧所建。在广东，据清代郭遇熙的《创建天后庙文峰塔碑记》云：“然浮屠孤峙，而守塔之僧徒焚修无地，亦非经久之计。城北旧有天妃庙……遂建庙数楹，辉煌金碧，准提精舍，列于其后，而塔工亦以次营构。”^[50]文中的文峰塔在广东省从化县，由文知佛塔焚毁后修筑在天后庙内。在澎湖，光绪年间的《澎湖厅志稿》中《建修西屿塔院落成碑记》云：“宫其前，奉天后之神。厂其顶，悬长明之灯。所有常住日用之资，与夫敬神香烛、灯油之费，则谗众而出诸同欲焉……澎湖自来无僧，今既建城隍庙，延僧住持；而西屿塔院又不可以土民职掌，遂属僧人分司其事。日用香烛之费，开列于左。”^[51]从文中可知供奉妈祖的西屿塔院由僧人主持。

妈祖直接在寺院中建祠祭祀，僧人参与妈祖庙的修建打理，寺院将附近的妈祖神祠收入到寺院系统，充分体现了浙江妈祖信仰的佛教印记。由此可见，“佛教化”是妈祖向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佛教性是妈祖不能忽视的神格属性。

注释和参考文献：

[1]谢重光：《妈祖崇拜宗教类型之我见》，《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0年第4期，第38页。

-
- [2]彭文字主编：《妈祖文化研究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 [3]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5页。
- [4]王荣国：《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1页。
- [5][清]许瑶光修，吴仰闲等纂：[光绪]《嘉兴府志》卷十，清光绪五年（1879）刊本。
- [6][明]刘基撰：《刘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 [7][清]战效曾修，高瀛州纂：[乾隆]《海宁州志》卷之六，清乾隆修道光重刊本。
- [8]许傅霈等原撰，朱锡恩等续撰：[民国]《海宁州志》卷七，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 [9][清]许琰撰：《普陀山志》卷十五，清乾隆刻本。
- [10][清]许琰撰：《普陀山志》卷十五，清乾隆刻本。
- [11][明]樊维城修，胡震亨纂：[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之三，明天启四年（1624）刊本。
- [12][清]雷铎修，王棻纂：[光绪]《青田县志》卷七，光绪六年修民国二十四年重印本。
- [13]蒋维钺、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散文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 [14][明]刘伯缙修，陈善纂：[万历]《杭州府志》卷之九十八，明万历刻本。
- [15][明]吴之鲸撰：《武林梵志》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清]周炳麟修，邵友濂孙德祖纂：[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 [17][清]于万川修，俞樾等纂：[光绪]《镇海县志》卷三十，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 [18][清]彭润章修，叶廉锬等纂：[光绪]《平湖县志》卷二，清光绪十二年（1886）刊本。
- [19][清]彭润章修，叶廉锬等纂：[光绪]《平湖县志》卷九，清光绪十二年（1886）刊本。
- [20][清]郑璟纂：[道光]《乍浦备志》卷二十，清道光23年（1843）补刻本影印。
- [21][明]何汝宾纂：[天启]《舟山志》卷之四，景钞明天启六年（1626）何氏刊本。
- [22]蒋维钺、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碑记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
- [23]政协舟山市普陀区委员会教文卫体与文史委员会编：《普陀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渔港沈家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388页。
- [24][清]陈梦雷编着，蒋廷锡校订：《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第一百十七卷，故宫博物院典藏雍正四年铜字活版本。
- [25]印光大师修订：《普陀洛迦新志》，福建莆田广化寺出版，第365页。
- [26]方长生主编：《普陀山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 [27][清]善广修，张景青纂：[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民国五年黄志璠再增补铅印本。
- [28][明]苏伯衡撰：《苏平仲集》卷六，四部丛刊景明正统本。
- [29][清]严思忠修，蔡以瑞纂：[同治]《嵊县志》卷七，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
- [30]陈荣富著：《浙江佛教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5页。
- [31]阙名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
- [32]高育仁著：《明清台湾碑碣选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国69年，第618页。
- [33][清]曹梦鹤修：[嘉庆]《太平县志》卷之八，清嘉庆十四年刊本。
- [34][明]苏伯衡撰：《苏平仲集》卷六，四部丛刊景明正统本。
- [35][清]皮树棠修，皮锡瑞纂：[光绪]《宣平县志》卷之九，清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
- [36][清]潘绍诒修，周荣椿纂：[光绪]《处州府志》卷之八，清光绪三年（1877）刊本。
- [37][清]张宝琳修，王棻纂：[光绪]《永嘉县志》卷之四，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 [38][清]皮树棠修，皮锡瑞纂：[光绪]《宣平县志》卷之九，清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
- [39][清]魏岷修，裘琰等纂：[康熙]《钱塘县志》卷之十四，清康熙刊本。
- [40][清]许琰撰：《普陀山志》卷十二，清乾隆刻本。
- [41][唐]释澄观撰：《华严大疏钞》卷八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 [42][宋]黄仲元撰：《四如集》有宋福建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一，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嘉靖刻本。
- [43][南北朝]迦叶摩腾撰：《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4][元]李士瞻撰：《经济文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石秀峰撰：[民国]《盖平县志》艺文志卷十六，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46][清]赵炳文修：[光绪]《大城县志》卷之十一，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47][清]沈家本荣铨修，徐宗亮蔡启盛纂：[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三十八考二十九艺文二，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48][元]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49][清]胡之鋹修，周学曾纂：[道光]《晋江县志》卷之十六，清钞本。

[50][清]郭遇熙修：[康熙]《从化县新志》艺文志，清内府本。

[51][清]林豪修：[光绪]《澎湖厅志稿》澎湖厅志卷十四，清抄本。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